

文 献



Wenxian 11

文 献

第十一辑

北 京 图 书 馆

《文献》丛刊编辑部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三月

文 献

第十一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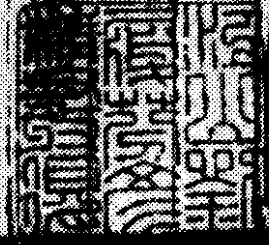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8.5 字数200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0.90元
分类号码: G256—5 统一书号: 17201·19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怨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第五回

东观阁本《红楼梦》目录页上之刘履芬收藏章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

東觀閣本《紅樓夢》書頁及劉履芬批語

大
學
報

打第一事正錄列丁機

[illegible]

主權之國者，其先民事，則世中外咸志願懷。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新出土明孝宗“罪己诏”（局部）

一見奇能

宋先生著

內藏經緯造作總括
一切生財備用松隱真訣

書林楊素卿梓

天工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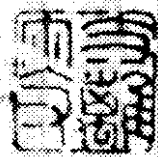
天工開物序

天覆地載物茲號萬而事亦
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
於事物而免萬矣。不待口授
目成而後識之。其與集何萬

北京圖書館藏楊本《天工開物》的扉頁及序

日下新詠

幸直



前因居士

神京形勝冠諸方左繞滄溟右太行南面居尊

臨萬國龍蟠虎踞奠金湯

明興地指掌圖云京師形勝甲天下康山

帶海此有金湯之固又元史稱幽燕之地龍蟠可虎踞形勢雄偉駐蹕非此不可

層樓高聳五雲邊鬱鬱蔥蔥萬雉聯當郭燕城

御碣皇都篇合帝都篇

永定門外正南半里許有崇文門

為燕墩項而正中樹碑一統志云

御製皇都篇

目 录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 吕振羽遗作(1)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二)

..... 谭其骧、周汝昌、谢国桢、汪长柄、潘天祯、(10)
肖 璋、赵光贤、朱士嘉、杨廷福、刘尧汉

《高适集》版本考 孙钦善(27)

韩文琐札 吴小如(38)

关于柳宗元文学成就的评述 吴文治(43)

高则诚文辑 侯百朋辑录(62)

谈刘履芬东观阁本《红楼梦》批语 王卫民(74)

小说家之鲁迅 顾随遗作(87)

茅盾小传 沈雁冰遗作(101)

读史札记三则 张大可(113)

王先谦《汉书补注》质疑 李廷先(125)

黄巢被害与唐军收京日期考订——兼介绍宦唐

朝鲜学者崔致远《桂苑笔耕集》 李希泌(139)

《平巢事迹考》为茅元仪所著考 臧 嵘(145)

新出土明孝宗“罪己诏”与传钞本《明实录》

校勘记 王咨臣(155)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

谭其骧自传(164)

唐写原本《玉篇》之研究.....胡吉宣(179)

北京图书馆藏杨本《天工开物》.....潘吉星(187)

《日下新讴》题〔清〕前因居士 著 (198)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

《日下新讴》与乾嘉之际的北京.....陈金陵(214)

清代编修方志概述刘光禄(222)

凤阳方志考王剑英(230)

古代石刻叙录(五).....北京图书馆金石组(248)

· 古代文献知识 ·

古代的目录(下).....高路明(255)

· 文献之窗 ·

《水浒传》的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及其它.....官桂铨(263)

《藏园九种曲》之次序.....薛英(264)

关于《岐路灯》的排印本.....卢维春(266)

黄县丁佛言先生遗著目录王献堂遗作(267)

〔补白〕

姚克夫:我国戏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戏文概论》(9) 史愚:新校注本《红楼梦》出版(37) 学文:学术刊物《词刊》创刊(61) 吴景熙:夏别士与梁任公(101) 薛英:汲古阁之刻书“广告”(186) 曹家后:关于子游的生卒年(197)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一九六四年

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吕振羽

编者按：本刊发表的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同志的遗作《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一文，是作者蒙冤幽禁期间所写的“读报随笔”中的一篇。当时他手边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图书资料，唯一能见到的只有一两份报纸。这篇文章，就是从报纸上读到白寿彝同志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后，写下的关于我国史学史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意见。吕振羽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后，原想对这些文稿进行整理，但因被摧残致疾，不幸逝世，计划未能实现。这篇文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可看出这位老一辈史学家对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关心之切，亦可见他的风格和精神。今征得江明同志同意，特在本刊上发表。

一、中国史学史的编辑，即一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中国史学史的编辑，是一项很重大的而又是开创性的工作。白寿彝、吴

泽等同志初步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已着手进行，是一件大好事。

我国历史时间很长，资料很丰富。从旧、新石器时代，即原始公社制时代开始，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从最近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经周口店猿人以及资阳人、柳江人、马坝人、丁村人），已有六、七十万年的历史；从甲骨文开始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四千年；从历史著作的《国语》、《左传》等书算起，也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从这样那样观点论述和体例编撰的正史、稗史等史书，真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不是历史编著，在诸子书或文集中表现历史观点的也很不少，对此，史学史研究都不能置之不顾。自然，我们的史学史应该而且必须是厚今薄古的；应该而且必须贯彻阶级观点的线索去揭发其发展规律。

因此，中国史学史研究编辑工作，确实是很艰巨的。以往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家，除去一些所谓“书目”、“提要”之类，却没有留下什么更多更有用的成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史学史的科学研究和编辑。这一艰巨的工作任务，也只有在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和作出好的成绩来。

寿彝同志的文章提出不少重要问题和意见，而且其中有些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不是说，文章已解决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编辑任务的全部问题。

二、寿彝同志的文章明白地肯定：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我认为这是没有争论余地的。又继续说：

在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的浪潮不断地高涨，中国史学领域里表现为空前尖锐的斗争。在这里，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象一根红线一样鲜明地贯串着整个史学的发展。

这就是五四以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

五四以前，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历史观点相对立。在史学史上，当在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有反映新兴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当同一性质社会内部出现阶段性变化时期也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跟反动的、落后的观点相对立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

在阐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

这样的设想和提法，其若干基本论旨，我以为是对的。问题在于，解决中国史学史的具体研究的具体问题，似是还应更明确地、强调地抓最基本的线索。

历史上的所有历史著作，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为其所属阶级服务的；是各别阶级、阶层相互关系和斗争，即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在历史战线上的反映。

史学史是历史科学领域中专史研究的一种，因此，研究史学史的基本线索是阶级分析法。某些历史著作所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与哲学史的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相适应的。这种观点和思想，反多出现在稗史、子书或文集中，而很少包含在所谓“正史”中。

我国史学史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以前的历史编著的历史观中，系统的唯物主义是没有的，完整的辩证观是没有的。在欧洲，即使在黑格尔，也是在“绝对精神”或普鲁士王国就停止发展了。从以往的历史著作中，指出其所包含唯物主义观点、朴素辩证法观点及其圆圈式的发展过程，察知其如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准备

条件,或以之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古代中世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近代的一切历史编著中,阶级性的表现,往往是较直接、较明显的,不象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反动资产阶级的历史编著那样转弯抹角,甚至以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形式出现。所以他们对某些关涉到不同阶级利益较严重、较突出的问题上,往往较直接地表现其一定的阶级立场和论断——适应于一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例如:废井田、开阡陌问题,前汉限田问题,汉武“征西域”问题,王莽“变法”问题,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华北沦陷问题,唐代租庸调法与两税制问题,王安石变法和辽金和战问题,对待元朝统治的态度问题,清军入关与迎清反清问题,戊戌“变法”“维新”问题,等等。总之,不同史家对待那些历史问题的不同观点、论断,是起进步作用还是起保守反动作用?对人民、对民族生死、存亡、利害等关系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如何?是站在爱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卖国的一边——或出之以暧昧、模糊?……凡此,都应结合当时的阶级构成、阶级关系和各自的不同要求进行分析。

三、历史过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在阶级社会时代则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围绕着错综复杂的次要矛盾,形成其不断发展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以及新的过程的交替。历史和一切事象的发展、变化,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瞬间。以往时代的历史家,不论其立场、观点、方法如何,都不能不接触、叙述那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历史事变和事象,只是有的在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基础上,构成其朴素的、零片的历史主义观点,有的则费尽心机地加以形而上学的歪曲……。那种较原始或朴素的历史主义观点,在我国中世的史学传统上是较丰富的,并有其多多少少的发展。

儒家的孔丘和其学派,也不能不看到所谓“夏礼”、“殷礼”、“周

礼”即夏、殷、周社会制度的不同及其相“因”的关系和所谓“朴”、“质”、“文”的变化。所谓继承孔丘《春秋》心传的左丘明，在其较原始的历史观点上，确实不同于孔丘，虽然他并没有超出孔丘的立场。白文谓：

《左传》在全书范围内展开了春秋时期社会矛盾的记述，视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估计是否过高了呢？白文揭出的论据是：“它传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论点。”这确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历史变化的情况，也表现了左丘明的一些论点。在当时各国诸侯互相侵夺，强吞弱，大并小，各级领主相翦灭篡夺的社会情势面前，各国领主中也有不少人兴过类似的感慨。据记忆，如晋、鲁的卿、大夫中，就都有人说过这类话。因此论据似是还不够一些。寿彝又引左氏“同情齐国的权门陈氏，记述齐国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同情鲁国的权门季氏，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见《左传》昭公三年和三十二年）。《左传》是凑巧了，它在这里同时表现了一种历史观点和一种进步的政治观点”。这是从春秋战国之际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界线的同志们共同常加引用的例证。为着说明春秋战国之际经过革命转变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便通过类此的史实来说明。不过，我总觉得，这类论据似乎不够有力。与其他两家共三分了鲁“公室”的季氏，田和以后的陈氏的齐国（为“七雄”之一）；我看他们与鲁“公室”或姜氏的齐国，同是封建领主，看不出他们有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举措。以著名的孟尝君来说，他和领地“薛”的关系，表现他是封建领主而不是“新兴地主”。自然，我在这里，也可能是偏执自己的旧看法。但我并不否认《左传》包含有进步观点。它的系年叙事，体现了一种随年月演进的历史线索（尽管它只是一些历史事象的敷陈），就是一大贡献。

春秋战国秦汉间，有不少个人论著，多多少少地涉及了所谓“变”的朴素的历史观，尤其在所谓“法家”的论著中；特别是《商君书》和《吕氏春秋》，还盖然性地把历史看作“上古”、“古代”、“当今”……等演进过程。他们中有些人还描绘了关于原始社会，即所谓“太古之世”、“上古”、“邃古”……的零片情况——我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曾极力搜集过，以之来论证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

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年来有些同志把他估价得过高了，忘记了他只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进步史家。但不容否认，他对我国中世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不小作用，贡献相当大。他继承已往的各种编史体裁而加以创造发展，较全面地搜罗，较严肃地抉剔、处理了史料，编著成包括《本纪》、《世家》、《表》、《列传》、《书》等一百三十篇、五十万言的《史记》（其中《三皇五帝本纪》则系司马贞补入的）。最可贵的，他能朴素地或模糊地触到了人民对历史的作用，能注意并叙录了下层人民的活动及表现，如为陈涉立《世家》，叙述其对“亡秦”的作用，为“日者”、“游侠”立列传，抨击了项羽所至烧杀的暴行，汉代“外攘”“内兴”加于人民的繁重负担；而又朴素地盖然性地叙述了社会经济、物质生活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在论断中，他注入了无神论思想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尤其是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对由所谓“封建”到“郡县”，对社会经济等方面，贯注了朴素的“变”的观点。他的朴素的“厚今薄古”，反对“今不如古”观点，与其他有关观点、论旨统一起来考察，表现他已有了一种朴素模糊的进化观点。从班固的《汉书》到赵尔巽的《清史稿》，基本上都是沿袭《史记》的体裁……虽然大都有所损益，尤其是多篡改其积极的观点而代之以消极的观点。但他并没有接触到历史的规律性；对他以前的某些人已提出的“上